

过渡货币、黄金与美援： 试论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币制改革

汪小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发行台币取代日据时期的货币。台币(旧)发行主要以法币为储备金,明确为过渡性货币。但由于发行体制的弊端,一开始就严重滥发。法币和金圆券失败后,国民党又无力保证台币发行的独立性而导致崩溃。国民党决定退据台湾,秘密搬运原中央银行黄金作为储备金,推行币制改革。新台币以黄金为本位,虽短暂阻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但导致储备黄金日渐消耗殆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重启援助国民党,美援也最终取代黄金,支撑了新台币信用。

关键词:台湾;货币改革;运台黄金;美援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9)04-0040-07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19.04.005

国民党退台初期,由陈诚推行的新台币币制改革对稳定台湾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台湾前“监察院长”王作荣回想:“那时候,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物价天天涨。所以,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是政府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发行新台币,把旧台币废掉。”^{[1]46}关于台湾币制改革的成功,有几点分析评论:一、新台币采最高限额发行,明文规定发行总额,以示政府无藉发行通货以为财政手段的意图;二、新台币以当时国际间最稳定的美元为计算标准,加深人民的信心;三、新台币可透过黄金储蓄存款与进出口贸易而分别兑换黄金与外汇,有兑现货币之性质;四、新台币采十足准备,可稳定币信基础;五、新台币采用公开发行业制度,又组织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可监督发行及检查发行准备,可使大众更有信心^[2]。诚然,陈诚的决心、蒋介石的决策、国民党技术官僚的精心设计,是币制改革能够实现的人为原因。但如果没有巨额的黄金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援,新台币也会如金圆券一般,势必无法维持。本文通过理清台币发行的来龙去脉,指出过渡性台币(旧)的体制弊端和崩溃缘由,进而分析国民党退台

初期选择黄金储备和以台币为中心的改革的机缘,讨论新台币改革推行后黄金消耗情况和台湾当局的因应,探究美援最终挽救新台币的历史缘由和结果。

一、台币(旧)崩溃的缘由与过程

台湾光复后,半独立于国民政府法币之外的台币(旧)长期陷入各种金融困境。其中原因,除了战后台湾经济环境不佳以外,也与特有的发行体制有关。

战后恢复营业后的台湾银行起到了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功能。根据台湾银行章程,在行政院随即核定发行台币应遵守之三点原则如下:1.最高发行额须报请中央政府核准;2.政府得酌情形停止台币发行,并规定比价以法币收回台币,以统一发行;3.台币之发行准备,应经政府核定遵照办理。随后,财政部对台湾银行之发行准备规定如下:

(一)法币不得少于发行总额百分之四十。

(二)物栈单应保险足额,过入保管行户名,依市价八折作价。

收稿日期 2019-01-06

作者简介 汪小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台湾史。

本文台币(旧)指的是台湾光复后由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货币,区别于1949年货币改革后的“新台币”。

(三)商业票据以合于“票据承兑贴现办法”规定之农业承兑汇票、工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为限，不得以台湾银行之承兑汇票抵充。

(四)公债以中央核准发行之公债为限，依票面七折作价。

(五)生产事业投资凭证以依照规定报部核定之生产事业投资凭证为限。同时，财政部尚规定，台湾银行应将发行准备缴存中央银行保管^{[3]23}。

可见新发行的台币(旧)是以法币和各种银行金融产品为储备金，缺少金银等硬通货，实际上是以法币为本位的货币。而且台币(旧)被明确为过渡货币，不得已为之。这种过渡性货币定位，早在陈仪接收台湾过程中就已经明确。1945年8月，台湾金融委员会制定通过了《台湾金融接管计划草案》，该《草案》规定台湾光复后，法币暂时不进入台湾，而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过渡形式的货币。《草案》还规定光复后台湾金融事业的接收事宜由财政部指派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共同组成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及上述四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简称四行二局)会同台湾省政府，具体负责共同组织接管台湾金融机构^{[4]126-129}。

起初，法币信用尚未完全恶化，按理台币(旧)也应该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台湾光复后，台币(旧)比法币贬值更为迅速。原因有二：

第一，在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法币之外的金融产品可视为有效储蓄，起到储备金的作用。但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起不到储蓄的作用，难以充当储备金，无法抑制货币滥发。光复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对日据时期发行的银行券采取收兑的方式处理，此举就消耗了大量新发行的台币(旧)。陈仪治台时期，采取统制经济，出于恢复台湾国营企业的目的，大量发行台币(旧)作为借贷资金。因此，一开始就没有遵循百分之四十法币作为准备金的规定，根本无法控制通货膨胀。鉴于此，194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公布《财政部派员监理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办法》，加强发行管理，派员驻在台湾银行执行以下之监理任务：

一、监督新台币之印制及发行；二、检查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三、审核关于新台币收换旧台币(指旧台湾银行券)事项；三、封

存及保管已印未发之旧台币及印版戮记；

四、检查旧台币之印制发行数额及准备金之实况；五、其他奉令饬办事项^{[5]154-156}。

虽然这样，也根本无法抑制行政长官公署滥发货币的冲动。据统计，台湾各事业流动资金均系由各单位向台湾银行贴借，1945年借23.3亿台币，1946年借台币约122.7亿^{[6]101}。

第二，难以管控台币(旧)与法币的汇率。起初，台币(旧)与法币的比例为1比40，这个比例是行政长官公署和当时中央银行共同规定的。这个比例高估不少，按照上海和重庆的黄金牌价，台币(旧)的合理比例是1比21左右。当时台湾的货币黑市，台币和法币的汇兑是1比17至1比20左右。按照黄金牌价来看，黑市符合市场定价^{[3]23-24}。行政长官公署争取得这样的有利于台湾的兑换比例，除了行政长官公署的地位特殊以外，也和当时的具体经济环境有关。由于台湾物资奇缺，台湾银行无法取得上海方面的法币头寸，因此在台湾的内陆商人即无法将台币(旧)按官价(1比40)兑取法币，只好将台币(旧)贬值来换取黄金、美钞、法币，于是台湾的黄金、美钞的价格也常比上海市为高^{[7]343}。台币(旧)被高估的结果就是诱发走私和舞弊。战后的台湾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环，上海也迅速成为台湾对外经贸的主要城市。台湾出口以米糖为中心的农产品到上海，并从这里进口日用的工商产品。

表1：光复初期台湾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单位：旧台币百万元

	贸易总值		进口值		出口值	
	对大陆	对外国	对大陆	对外国	对大陆	对外国
1946	3,555 (94%)	211 (6%)	1,046 (96%)	38 (4%)	2,308 (93%)	173 (7%)
1947	54,179 (93%)	5,461 (7%)	20,738 (88%)	2,758 (12%)	33,441 (93%)	2,702 (7%)
1948	357,885 (96%)	55,898 (4%)	170,761 (91%)	16,751 (9%)	187,120 (83%)	39,147 (17%)

数据来源：台湾省政府主计处编《台湾贸易五十三年报》。转引自潘志奇：《光复初期台湾的通货膨胀》表3-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第72页。

从表1就可以看出台湾对两岸经贸关系的严重依赖，一旦台币(旧)的法币储备不足，就会直接导致日用品的暴涨。从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米价就上涨了5倍多，鸡蛋涨了9倍，连盐也涨了18倍

多^[8]。

随着国民党的失败,法币迅速贬值,台币(旧)又被低估。传导过来的通货膨胀更为迅速刺激台币恶性通货膨胀。省政府发行货币量受制于行政院,与法币的兑换比例也受管控,根本无法独善其身。魏道明上台后,台湾的金融困境并未有好转,而是渐趋恶化。台币(旧)发行量 1946 年底已达 53.3 亿余元,相较前一年底增加 1.31 倍,1947 年底为 171 亿余元,又增加 2.21 倍,1948 年底高达 1420 余亿元,增加 7.29 倍^[9]。1948 年初,由于法币快速贬值,财政厅长严家淦不得不升值台币对法币的汇兑。2 月 21 日,台币对法币的挂牌价格是 1 比 112,一个星期后,台币挂牌价升到 1 比 137^{[10]172}。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中央实行金圆券改革,规定法币与金圆券的比例是 1 比 1835。是日,台湾省政府设立经济警察总队,打击投机^{[10]174}。方案规定台币最高发行限额为 430 亿,但 8 月 20 日就已经突破 420 亿,因为要收兑金银外币,台湾银行紧急要求中央增发 560 亿元^{[10]174}。金圆券在 8 月 23 日实施以固定比率,在 11 月 1 日改为机动调整,但金圆券面值明显被高估,透过汇兑关系使得大量金圆券流入台湾。11 月 1 日的金圆券对台币 1:1000,到 12 月 30 日 1:222,但 1949 年 1 月的 1:80,5 月却狂贬到 2000:1^{[11]77},金圆券崩溃很快就以贸易形式传导到台湾,台湾物价一发不可收拾。当时严家淦作为台湾财政的负责人,常年奔波在两地,谋求兑换比例符合实际,但是根本无济于事,台币(旧)与金圆券一样也趋向崩溃。

二、新台币改革的推行与运台黄金

1949 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另起炉灶图谋再起。国民党币制改革是其退台后的最重要财经举措。吴国桢曾评论蒋介石控制政府的手段时说:“如果你要控制一个政府,至少控制两件东西,即钱和剑。”^{[12]132}一方面,蒋介石通过任命军人陈诚稳定台湾局势,也就是握紧剑。对于钱,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最忧虑的是货币问题。迁台初期,百万军民入台,造成台湾严峻的经济压力。

蒋介石决心以台币为中心实行币制改革,过程颇为曲折。虽然台币发行本来就被定义过渡性质,问题很多,理应改革。但金圆券失败后,国民党迫切需要搜刮硬通货,顽抗全国解放。因此对如何进行货币改革,实际上取决于蒋介石对台湾的战略思考。

先是大陆法币崩溃,蒋介石一筹莫展。从抗战胜利时的 5569 亿元发行额,迅速膨胀到 1947 年 2 月底的 48378 亿元,1948 年 8 月 21 日金圆券发行前已达 6636944 亿元,又较 1945 年 8 月膨胀了 1190 多倍^{[13]85-162}。1948 年 6 月,蒋介石就因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怪罪宋子文,宋在处理金融问题上已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 1948 年 6 月 10 日日记记载:

白米每石已至七百万元,美钞闻已涨至一百五十万元。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此皆(宋)子文种其祸根与恶因,而余之疏忽过信、所用非人,实应负其重责也^{[14]96}。

进入 8 月,蒋介石迫切谋求币制改革。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和行政院长翁文灏投蒋所好,开始实行法币金圆券改革。8 月 19 日,蒋介石日记记载:

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因(宋)子文、岳军(张群)、公权(张嘉璈)、(俞)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虽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然咏霓(翁文灏)与(王)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14]133}。

翁文灏和王云五都非财经人物,金圆券改革其实非常仓促和无准备,可谓病急乱投医。蒋介石也知道此举非常冒险,改革后几天内,蒋介石都十分不安。财政上稍有所得,蒋介石就因此而洋洋自得。8 月 31 日日记载:

改革币制,凡自称财政与经济专家者皆持反对,不惟怀疑,而且预料必立见失败。但实施以后十日之间,收兑现金有美钞 2700 万元之多,此为任何人所想象不到者^{[14]140}。

蒋介石很快就因违反经济规律蛮干而自尝苦果,金圆券大败,物价完全失控。金圆券改革失败,迫使蒋介石加紧搜刮黄金美钞等硬通货。1948 年 11 月 10 日,蒋介石手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说:“中央银行总行准备迁驻广州,其重要档案账册及金银现款应即分运广东、福建与台湾各省切实保存为要。”^{[14]186}据记载,11 月份,黄金二百多万两开始装箱,计 774 箱。12 月 1 日,自上海起运,于基隆登陆后运往台北。此后黄金陆续运输。1949 年初,蒋介石下野,谋另起炉灶。1 月 10 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慰勉俞鸿钧,并指示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2 月 8、9 两日,周宏涛奉蒋介石命抵上海,与中央银行总裁刘攻

芸晤谈。10日，周自上海携报告返奉化面见蒋介石，告以黄金多已运抵台湾，现全国黄金台北存2600万两，厦门900万两，美国380万两，共计3880万两。

随着大陆地区逐渐解放，蒋介石越来越把台湾作为所谓的“复兴”基地。1949年初，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建议陈诚去杭州面见蒋介石，提议币制改革，要求中央银行从上海带过来的黄金中，拨付80万两，做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146]。不过当时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决心。付出真金白银是否能稳定台湾这个后方，尚未可知。对蒋介石来说，过去宋子文为稳定法币，曾经抛售黄金来稳定币值，其大败而归的往事言犹在耳。此时，宋子文又反对台币独立发行，据陈诚回忆：

故我们这项币制改革，其要点为（一）用台湾银行钞票。（二）以美金为计算单位。（三）地区则以台湾一省为限。这三点与当时宋子文先生所提出的主张有异，宋先生的主张为（一）用中国银行钞票。（二）以英镑为计算单位。（三）将闽粤台三省联在一起。宋氏因其主张未为我们采纳，曾对严家淦颇滋误会^[145]。

宋子文的主张显然有悖于形势的发展，闽粤无险可守，不可能抵挡住解放军的步伐，蒋介石也因此愈发不信任宋的金融政策。为赢得蒋介石信任，宋子文不得已转而支持新台币改革。1949年4月30日，宋子文电报蒋介石台湾金融改革事项，说台湾金融改革方案拟竣，并已与俞鸿钧讨论接洽，所需新钞票均已印就，运台北交省主席陈诚妥为保管。他自己因身体日益疲弱，拟赴欧疗养。5月1日，蒋介石回复：“贵体疲弱甚念，望往欧洲以前，对于订购武器事能决定方针，克于方面所进行之武器，除105口径以上重炮与战车不要外，余可代购也。台湾改革币制，应督促速办。兄能在台湾币制定后再行为盼。”^[14272]宋子文是30年代法币推手，但在新台币发行上，实际上他已经边缘化，遂萌生去意。

5月，陈诚赴广州（时行政院驻地）参加粮政会议，再度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币制改革的建议并获得解决。陈提出：一、关于军公费垫款，中央允以存在台湾的物资与黄金折算归垫；二、中央允将在台生产事业完全交由我负责管理，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陈诚统筹调度；三、中央拨借黄金八十万两作为改

革币制基金^[1544]。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解放上海，这使台湾贸易引以为命脉的沪台线中断。当时孙越崎领导的资源委员会资委会集体起义，严家淦与国民党中央决定台湾省的经济金融必须建立独立于大陆的完整体系^[16451]。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系显然不满蒋介石把黄金运到台湾的作法。6月1日，张道藩报告蒋介石说李宗仁、白崇禧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指蒋介石藏匿美金一亿之多。蒋介石日记记载：“更觉李、白之用心害陷及其人格之卑劣，居（正）、于（右任）之投桂卖党更为可耻。”夜长梦多，蒋介石加快币制改革步伐。6月3日，俞鸿钧与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见蒋介石，报告外汇头寸及厦门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5千万美金，决定币制改革。当天，蒋介石日记记载：“此乃最重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并记下当前要务：一、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矣；二、立即召集台湾军事会议，解决兵额编组与部署巡防、通信、交通等问题；三、东南兵额总数之决定；四、水雷制造与敷设技术之研究与准备^{[14]293}。可见，蒋介石把币制改革当作隔绝大陆经济联系的最重要举措。而且也很清楚，一旦实行币制改革，必须对台湾实行严格往来大陆的管控。6月7日，蒋介石手谕陈诚关于台湾防务时指出：

台湾缉私工作为今后军事经济与政治最重要工作之一，如用非其人或不能得力，则整顿军政皆无从谈起，但台澎海上之巡查必须将闽厦沿海线亦包括在内，方能完备也。又，台湾由沪、青及其他各地所运来各机关之物资整理与登记，亦为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应速派定最有能力人员负责主持，限期清查整顿完成要，因其于以上各项工作之急不及待，不能再延，故特草函备考，并望提先急办为荷^{[15]614-615}。

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府大楼（现为“行政院院址”）灯火辉煌，省府主席陈诚，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坐镇省府大楼会议室，与省议会会长黄朝琴等多人，开会决定宣布即日实施台币改革，发行新台币，收回旧台币^[1825]。根据财政厅长严家淦亲自拟定的《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

《蒋中正日记》（未刊本），1949年1月10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九册，第243-244页。又参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5，第129页。运台黄金总数与过去一般研究所认为的260万两差距甚大，此处存疑，暂且以《年谱长篇》为准。

办法》及《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台湾正式发行新台币。改革币制的重要规定,据《陈诚回忆录》整理大致如下:

由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总额二亿元。

因国际上现以美金比较稳定,且本省对外贸易大部分亦系输往日本及其他美金区域,为求新台币稳定起见,乃以美金为计算标准。

新台币对美金之汇率以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较战前之币值略低,足以刺激生产增进出口。新台币发行总额折合美金四千万。

新台币对旧台币之折合率,定为旧台币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并限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无限制兑换新台币,在兑换期间,旧台币亦可照上列折合率流通行使。

黄金、白银、外汇及可换外汇之物质作为十足准备金。

新台币在省内得透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得透过进出口贸易兑换进口所需之外汇。故新台币之发行,系以金银外汇十足准备,以五元对一元美元之比率联系于美金,对外放弃与金圆券之联系,以免受金圆券贬值之影响。……^{[15]44-45}

新台币发行办法,在严家淦的主导下,设计非常缜密。虽然欠缺现代货币之灵活性,不适应经济情况变动,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的目的在于恢复台币的信心,牺牲灵活性在所难免。隔绝大陆经济联系和充足的准备金是新台币发行的先决条件,由于这两个条件准备充分,新台币得到及时发行。新台币发行后成功压抑物价,逐渐降低恶性通膨的预期。新台币发行当日,严家淦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省币制改革》的书面谈话指出:“币制的改革,并不重在形式上的变更,而重在两个条件:第一,贸易收支的平衡;第二,财政收支的平衡。”^{[17]825}其中有关贸易收支的平衡方面,在书面谈话中也引用数据,指出透过基隆和高雄港务局的进口货价值统计数字,光复后台湾受战时破坏,生产减退,出口低落,故 1945、1946 两年贸易均为入超。但自 1947 年起,即已好转变为平衡。1949 年出口物资产量大增,以重要出口物品砂糖为例,1948 年生产 26 万吨,1949 年生产 63 万吨,

增加的 37 万吨,均可输出,即可增加收入美金 4000 万元,故出超是有希望的,贸易收支平衡是有把握的^{[17]825-826}。这篇文章主要目的在于稳定人心,增强公众对新台币信心。有些说法显然是粉饰有余,实际不足,夸大了台湾对外贸易的作用。台湾贸易对象主要是大陆,随着大陆地区的逐步解放,贸易收支必定失衡。在与其他国家贸易开展之前,当局并没有可靠外汇收入,势必只能以抛售黄金度日。

三、新台币信用从黄金储备转向美援支撑

在新台币发行之同时,台湾省政府为确保币制改革成功,先后采取了多项政策。如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取黄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在币制改革之前,当时台湾省地下钱庄发展很快,以非法营利吸收资金,作不正当营业,囤积居奇,刺激物价波动,扰乱市场金融。台湾省政府先后查知地下钱庄四百八十多家,取缔未经核准设立的银楼四百三十多家,珠宝店二十余家,并禁止携带金银外币出境^{[15]45-46}。关于黄金,开始时规定民众将新台币 280 元存入台湾银行,经过 10 天后即可取得黄金 1 市两。但由于这一黄金价格随新台币贬值越来越低于市价,随后又规定搭配节约储蓄券,再改配爱国公债,以变相提高黄金价格。然而最终还是因黄金储蓄有限,而新台币发行量增加不止,此政策难以为继,不得已于 1950 年 12 月份终止。但至此,黄金政策已历时 18 个月,吸收新台币达 4.4 亿元^{[11]110}。1949 年底,通货膨胀得到一定抑制。如以 1949 年 6 月份为基础,台湾的零售物价指数在该年下半年内上升了 80%^{[18]37}。但是 1950 年吴国桢任省主席的时候,通货膨胀仍然高企,而黄金日渐消耗,这方法后也被取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从 1950 年初开始,台湾当局采取疯狂的高利率政策,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1950 年 3 月推行“优利储蓄存款”办法。存款利率最初规定:一个月定期存款为月息 7%,如按复利计算折合年息为 125%。两个月定期存款为月息 8%,三个月定期存款为月息 9%。同时规定,各银行在接受该项存款后,应立即转存台湾银行,由其专门经营放贷业务。优惠利率储蓄存款是很有成效的。1950 年初,所有银行中的定期存款总额仅为 200 万元新台币。实行优利存款后仅仅 8 个月内存款总额就增加到 3500 万元新台币,约

占货币投放量的7%^[19]。如果经济形势得不到有效缓解，高利率只能是一种“拖延政策”。除了利用高利率拖延经济危机，黄金储备的急剧减少，也使得蒋介石忧心忡忡。1950年3月31日，针对黄金储备减少，蒋介石日记记载：

新台币虽未澎涨(膨胀)，但黄金售出之数，三个月来已有六十余万两之多，现存黄金总数已不足壹百五十万两，而米价已上涨至百元，殊为可虑，幸军费确定，今后财政运用与收支已定有办法，当不致如过去浸无管束与限制矣。议定每月黄金售出总数，不得超过七万两之数^{[14]470}。

不过情况并没有实质好转，朝鲜战争爆发前夕，1950年6月10日，蒋介石召开财政座谈会，蒋介石及“行政院长”陈诚、“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财政部长”严家淦、“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等出席。俞鸿钧报告，黄金存量中央仅五十四万余两，台省发行基金仅六十余万两。吴国桢向蒋介石报告，保证在7月15日以前，黄金储量无问题，并说明强迫储蓄当可收回一部分黄金。严家淦当时指出，他过去主张增加发行台币，但是现不敢做此主张，恐影响整个金融。蒋介石害怕黄金枯竭，但是财政支出又不能少，可以说当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因此已经做好财政破产、实行全面配给制的准备。在座谈会上，蒋介石最后无奈指示：“须做美国不会援助，最后全岛被苏联潜艇封锁之准备。美国不能援助，如过去之苏联及土耳其，尚能抵抗侵略，争取最后之胜利，并指出配发实物之重要性与可能性。”^[2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对台政策，转而积极援助蒋介石。这一改变最终挽救了新台币，阻止了一触即发的恶性通货膨胀。

7月7日，蒋介石召开财经临时会谈，研讨黄金储备等问题。“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报告全省财政金融情形，并说明至6月底台湾银行所存黄金外汇约74万两，其中黄金和外汇各值一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报告6月底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为48万7千余两。“财政部长”严家淦报告，3月17日至6月26日，军政费审核小组通过的预算外支出约合新台币9002万元，其中军费占8890万元，另有约数千万元尚未通过。而国家行局现存外汇约值美金1300万元，其中大部分一时不能动用。会议中，蒋介

石要求俞鸿钧和任显群详细研究黄金美汇价格如何调整、黄金储备储蓄办法如何改进、储户提取黄金应否加以管理、黄金如何收回、出口如何增加、外汇如何争取等具体问题，并要求于11日之前提出具体报告。此外，对于生产事业资金的筹措问题，要求俞鸿钧、严家淦和任显群迅速研讨后，再行报告^[20]。8月4日，蒋介石再次召集财政会谈讨论黄金储备等问题。得知中央银行存金只有40余万两，台湾省行亦只有50万两，惟美援经济款数略增，或可抵补不足^{[14]533}。可见，期盼已久的美援已经到达，情况暂时得到缓解。到了8月底，蒋介石再次召开财经会谈，讨论9月军费问题，决定中央黄金支付减为每月3万两，并指示今后经济与财政方针，规定每月报告办法。8月24日日记载：“此实为最为重要之政务。”^{[14]539}军费开支一直是台湾财政不可承受之重，蒋介石此时敢于减低军费开支，可见军事援助当时已经得到了美援补助或者某种承诺。

1950年12月，美军事援助到达，蒋介石12月1日日记载：“弹药已到，其经援总署福克斯来台视察后，对其经援数量可望增加，而其来货亦可提前较速矣，因之经济危机亦可渐少矣。”^{[14]588}1951年2月，美台签订联防互助协定，5月1日在台成立“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以美军人蔡斯为首任团长。当天上午，蒋介石接见蔡斯。蔡斯团长告知任务是帮助维护及运用美援武器装备，决不包括干涉国民党军队的指挥系统^{[14]663}。至此，美国军事援助全部恢复，这直接减轻了台湾当局的财政负担。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台湾财政危机的实际情况，美国情报部门了解得非常清楚。1950年8月21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台湾国民党政权形势的评估指出：

似乎有证据表明税收已经接近了最大值，因为税收可能快接近福摩萨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或者更高，在像“台湾”这种低收入国家里面这是一种最大比例。然而这些收入仅仅满足了预算支出的60%，政府为了弥补赤字，有必要变卖黄金贮备和前日本殖民政府留下来的资产，实际上政府更多地利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对等基金。按目前变卖黄金的速度来看，政府可能在1951年就耗尽它的黄金储备。所以，除非行政当局能够尽量减少政府的支出，特别是降低相应的军事开支，在持续和不断增

加国外经济援助的支持下,1951年岛内的经济稳定才有可能实现^{[21][314]}。

直到 1965 年美援停止,除军事援助外,美国的每年经济援助台湾差不多平均一亿美金,以当时台湾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而言,美国经援的数额是一笔巨大数目。美援在台湾财经方面所占比重(一)美援相当于台湾“国民所得”8%(二)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中,美援占 26.7%(三)经济建设固定投资中,美援占 32.9%(四)台湾国际收支经常帐差额中,美援弥补 86%(五)进口总额中,美援占 38.8%(六)进口农产品中美援占 69.9%(七)进口非农产品中,美援占 28%(八)出售美援物资收回台币 182 亿^[22]。可见,新台币最终获得支撑与美援密不可分。

结语

由国民党技术官僚设计和推行的币制改革方案不能说不周到全面,币制改革也一直被看作是陈诚的治台良政。陈诚本人不懂财政金融,多负军事政治责任^[146],但是陈诚善于与国民党技术官僚合作,支持严家淦等财经官员推行改革,这是币制改革能够实现的重要历史机缘。从大陆搜刮来的黄金支撑了新台币最初信用不足的困境,短暂阻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为国民党政权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但是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最终支撑新台币信用的是美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目的,积极援助国民党政权,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台湾经济,这是国民党币制改革避免再次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 [1] 欧素瑛等访问、记录,陈立文主编,严家淦“总统”行谊访谈录[M]。“国史馆”印行,2013。
- [2] 朱传豪.台湾货币发行纪要[J].台湾银行季刊,1966年12月第17卷第4期。
- [3] 吴永福.台湾之币制与银行[M]。“财政部财政委员会”印行,1947。
- [4] 台湾金融接管计划草案[M]//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

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

- [5] 刘宁彦总撰,袁颖生编撰.重修台湾省通志.卷4.经济志金融篇[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1993。
- [6] 资源委员会复员以来工作述要[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五)。
- [7] 王晓波.陈仪与二二八事件[M].福州: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
- [8] 翁嘉禧.战后初期台湾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与对策[C]//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历史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9] 袁璧文.台湾之货币银行[J].台湾银行季刊,1961年3月第20卷第1期。
- [10]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大事记(下)[M].众文书公司印行,1968。
- [11] 潘志奇.光复初期台湾的通货膨胀[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 [12] 吴国桢口述,裴斐、韦慕庭整理.从上海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吴国桢口述回忆[M].吴修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13]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14]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九册)[M].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馆、中正文教基金会印行,2015。
- [15] 陈诚.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
- [16] 陈思宇,陈慈玉.台湾区生产管理事业委员会对公营事业的整顿(1949-1953)[C]//一九四九:中国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史馆”印行,2000。
- [17] 严前“总统”家淦先生哀思录[M].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94。
- [18] 于宗先.台湾货币与金融文集[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
- [19] 方晓珍,方晓宏,孙晓峰.战后初期台湾反通货膨胀三大政策评析[J].安庆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1)。
- [20] 任治平口述,汪士淳,陈颖撰.这一生:我的父亲任显群[M].宝瓶文化,2011:163-164.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九册),第506-507页,第164-165页。
- [21]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七编.台湾问题[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 [22] 美援运用报告[A].严档·再任“财政部长”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原档号 Art13213-642002。

Transitional Currency, Gold and American Aid: On the Currency Refor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Kuomintang's Withdrawal to Chinese Taiwan

Wang Xiaopi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